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熊彼特选集

——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

[美] 约瑟夫·A.熊彼特 著
(Joseph A. Schumpeter)

秦传安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熊彼特选集

——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美)熊彼特
(Schumpeter, J. A.)著;秦传安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书名原文:Ten Great Economists;From Marx to Keynes

ISBN 978-7-5642-0842-4/F·0842

I. ①熊… II. ①熊… ②秦… III. ①经济学家-思想评论-世界 IV. ①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960号

□ 策 划 吴晓群
□ 责任编辑 吴晓群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XIONGBITE XUANJI

熊彼特选集

——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

[美] 约瑟夫·A.熊彼特 著
(Joseph A. Schumpeter)

秦传安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321号乙 邮编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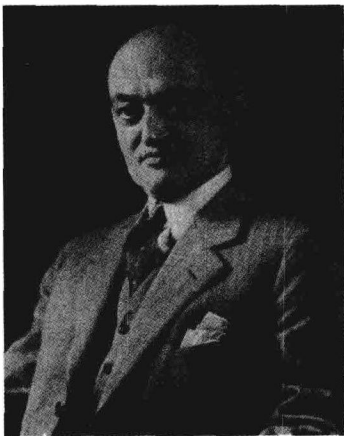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3.75印张(插页:1) 246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3.00元

译者序

约瑟夫·A.熊彼特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说：“熊彼特诞生100周年纪念(1983年)正好赶上了熊彼特经济学的一次复兴。如果说本世纪第3个25年可以公正地被称作‘凯恩斯时代’，那么，第4个25年完全有机会成为‘熊彼特时代’。”〔1〕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对20世纪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聪明。相反，熊彼特似乎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风光一时，而智慧千古不朽。”〔2〕



约瑟夫·A.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

熊彼特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地方，父母都是奥地利人。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熊彼特搬到了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他在那里念小学，直至10岁，母亲嫁给了一位退休的将军，这意味着他可以上奥地利最好的中学。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师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后者是卡尔·门格

〔1〕 赫伯特·吉尔施：《熊彼特时代》(The Age of Schumpeter)，载《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74卷第2号(1984年5月)，第103页。

〔2〕 彼得·德鲁克：《生态远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2000)，第117页。

尔的弟子。在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熊彼特在柏林度过了暑期,翌年接受了开罗国际法庭的一个职位,不久后,他回到维也纳大学提交了他的授课资格论文。1909年,熊彼特成为切尔诺维茨大学的副教授,两年后成为格拉茨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教书至1919年,其间只有1913~191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并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年31岁。在奥地利的最后6年(1919~1925),熊彼特投身于非学术工作,但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是作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还是出任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这家银行在1927年倒闭,使他债台高筑。困境之中,他收到了日本和德国两所大学的邀请,权衡之下,他加盟波恩大学,在那里担任了7年的经济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前不久,熊彼特移居美国,加盟哈佛大学,直至去世。他是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自1937至1941年任该学会的主席,194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49年当选为新创立的国际经济学会首任主席,孰料天不假年,1950年1月,67岁的熊彼特在康涅狄格州塔柯尼克山的家中去世。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包括:(1)经济理论演化史,以他死后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为代表;(2)经济发展理论,以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2)为代表;(3)商业周期理论,以《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 1939)为代表;(4)社会与制度的变革理论,以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彼特不仅是一个对经济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自己总是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统计学家,尤其是,如果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专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谈到熊彼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学识,不仅熟悉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之一),而且还熟悉经济事实和经济制度的历史,熟悉一般政治史和社会史。他在数学上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他获得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能够领会并有效地阐释那些即便在数理经济学家当中也被认为是复杂难懂的数学分析的问题。他不是统计学专家,但他对统计推论的逻辑和局限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紧跟新的方法和统计学材料。终其一生,他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熊彼特兴趣广泛,涉猎庞杂,对此,他的得意门生保

[1] 哈伯勒:《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载《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64卷第3号(1950年8月),第333页。

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这样描述：“他完全有能力十分内行地谈论任何东西，从伊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到中世纪的法律；有能力阅读（或者觉得他能阅读）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有能力概述形而上学理论。这种不囿于特定领域很重要，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现象提出大胆而有趣的假说。”〔1〕

熊彼特还是一个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不能不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正如吉尔施所言：“他始终是晚期奥匈帝国的高贵绅士，喜爱考究的衣服，精致的美食，优雅的举止，高雅的谈话，尤其是，喜爱漂亮迷人的女人。”〔2〕熊彼特曾谈到自己年轻时的野心，就是要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3〕熊彼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次结婚是54岁那年在纽约，妻子比他小15岁，名叫伊丽莎白·布迪，也是个经济学家，读者面前的这本《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便是她在熊彼特去世之后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是熊彼特的一些零散文章的结集，除了卡尔·马克思那篇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各专业杂志上的纪念文章。尽管出版于身后，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却是熊彼特在去世前几个月就同意的，而且，除了马克思那篇之外，其余的文章也都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正如熊彼特夫人所言，本书的作者与这些传记论文的主人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熊彼特不仅推崇他们的作品，而且，除了一个人之外（即马克思），这些人他都认识。由熊彼特这样一位备受推崇的经济学家，对他的前辈和同僚们毕生的工作作出切中肯綮的综述和评估，我想，这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吧。

秦传安

2010年8月8日，北京花家地

〔1〕 萨缪尔森：《作为教师和经济理论家的熊彼特》（*Schumpeter as a Teacher and Economic Theorist*），载《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33卷第2号（1951年5月），第99页。

〔2〕 吉尔施：《熊彼特时代》，同前引书，第104页。

〔3〕 西奥多·摩根（Theodore Morgan）1983年12月24日写给《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的信，转自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熊彼特：生平与工作》（*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 1991），第46页。

目 录

译者序/1

第 1 章 卡尔·马克思/1

第 2 章 马利·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斯/53

第 3 章 卡尔·门格尔/58

第 4 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66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 50 周年的
评价

第 5 章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79

第 6 章 欧根·冯·庞巴维克/103

第 7 章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136

第 8 章 欧文·费雪/159

第 9 章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172

第 10 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

第1章 卡尔·马克思*

人类智力与想像力的创造物,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多已消失得杳无踪迹,其存留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只有茶余饭后的片刻,长的也不过一代人的光景。然而,有些却不曾消亡。它们也曾销声匿迹,但后来又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某些无法辨识的因素而重现人间,而是穿着它们各自独特的衣袍,带着自身特有的疤痕——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而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创造物,我们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造。这一定义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似乎并无不妥。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一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不过,用复活来定义伟大,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因此变得不依赖于我们的爱憎。我们大可不必相信:伟大的成就,无论在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年)

* 本篇选自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年版。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 1999 年出版。——编辑注

基本构思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都是光明之源,或者都无懈可击。正相反,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就是黑暗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根本就是错的,或者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不同意它。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和反驳,正因为不能给它造成致命的伤害,从而只起到了彰显其结构力量的作用。

过去的20年目睹了一次极为有趣的马克思主义的复活。这位社会主义信条的伟大导师在苏联大行其是,这丝毫也不奇怪。这一封圣过程的唯一特征是:在马克思学说的真实含义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实践及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其宽度不亚于谦卑的加利利人的宗教与中世纪诸侯或军阀的实践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那条鸿沟。

但另一次复活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活。这一现象颇为有趣,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无论是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里,马克思主义的曲调都没什么重要位置。在美国,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浅薄的、琐碎的,而且没什么地位。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复兴,在那些先前深受马克思学说影响的国家,倒是没有促成类似的喷发。尤其是在德国——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在战后社会主义兴盛时期,确实有过一个正统的小宗派一直活跃着,就像在之前的大萧条时期一样。但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不仅有那些跟社会民主党结盟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实践问题上比小心谨慎的保守派走得更远的人)对回归老信条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他们一边对马克思敬若神明,一边小心翼翼地跟他保持距离,完全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经济问题。因此,在苏联之外,美国的现象尤显突出。我们并不关心它的原因是什么。但对于这么多美国人视为已有的信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一下它的轮廓与含义。^[1]

1. 先知马克思

让一个来自宗教世界的比喻进入本节的标题,并非缘于一次失误。它可

[1] 我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引用将局限于最低限度,同时不会给出关于其生平的任何资料。这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读者如果想得到马克思的著作清单及其生平梗概,可以在任何一部辞典中找到,尤其是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中。研究马克思,最方便的办法是从《资本论》(*Das Kapital*)第1卷入手。至于传记,尽管有大量更近期的作品,但我依然认为梅林(Mehring)的作品是最好的,至少从普通读者的立场来看是这样。

不只是一个比喻。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对于信徒来说,首先,它提供了一套终极目的(包括人生意义)的体系,是一套判断事件和行为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是引导人们达到这些终极目的的向导,它意味着一项拯救计划,并指示出人间的罪恶,人类(或经过选择的部分人类)将从这样的罪恶中获得拯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那个允诺人间天堂的子群。我相信,由一位圣典学家来阐述这些特征,将会为分类和评论提供机会,与纯粹的经济学家所能说出的任何东西相比,这样的分类和评论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关于这方面,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获得成功的原因。^[1] 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的科学成就完美得多,也绝不会赢得他那样的历史意义上的不朽美名。他的党派口号武器库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的成功,有一部分(尽管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确实要归功于他给他的教众准备了大量情绪激烈的短语、热情洋溢的谴责和义愤填膺的手势,这些在任何讲坛上都可以招之即来,随意发挥。关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弹药库曾经发挥并一直发挥着它的有效作用。但弹药的生产也带来了一点不利:为了给社会斗争的竞技场打造这样的武器,马克思有时候不得不迁就甚至偏离某些从其理论体系逻辑性地引申出来的观点。然而,倘若马克思仅仅是一位警言妙句的批发商,到如今他恐怕早已湮没无闻了。人类不会对这种服务感恩戴德,那些为政治歌剧撰写唱词的人,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但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这一成就的性质,我们必须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背景里呈现它。那个时代,是资产阶级成就的顶峰,是资产阶级文明的低谷,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尚未显露出新艺术和新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任何迹象,人们沉湎于极其令人厌恶的平庸。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正迅速地从所有社会阶层当中消亡,工人世界里唯一的一线希望——除了可能从罗奇代尔(Rochdale)的姿态和储蓄银行那里得到点什么之外——已经悄然熄灭,而知识分子却纷纷宣称,他们对穆勒(Mill)的《逻辑学》(Logic)和“济贫法”甚感满意。

此时,对于千百万芸芸众生的心灵来说,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人间天

[1]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征还解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者的典型态度。对这些正统派来说,就像对任何宗教信徒一样,反对者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罪的。不仅要在智性上而且要在道德上反驳异议。“预言”一旦得以揭示,对异议就不能有任何宽恕。

堂,就意味着一道新的光亮,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要你愿意,不妨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称为一种类宗教情感,或者是一种对信仰的戏仿——关于这一看法,有很多话可说——但是,别忘了赞美其成就的伟大。别在乎那千百万芸芸众生其实并不能从真正的意义上理解和欣赏马克思的预言。那是一切预言共同的命运。重要的事情是,这一预言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和传达的:它能够被当时有着实证主义头脑的人们所接受——本质上,这种思想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亦并无悖谬之处——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一方面,马克思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阐述了那种受到挫折和遭遇不公正对待的情绪感受(这原本是很多失败者自我治疗的姿态);另一方面,他宣称社会主义能够把人们从这种不幸中解放出来,这一点肯定经得起理性的验证。

瞧,一方面,不断衰微的宗教使得人们惶惶如丧家之犬,怀揣着超理性的渴望东奔西突;而另一方面,那个时代一度不可抗拒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趋势,却又不能容忍有着不科学(或伪科学)含义的任何信条,马克思成功地把人们的超理性渴望和时代的趋势编织在一起,这该是何等高超的技艺啊!宣扬终极目的不会有什么效果,分析社会进程只有百十来个专家感兴趣。但是,以分析为工具来宣讲,并着眼于人们的内心需要进行分析,这才是赢得热烈拥护的取胜之道。它使得人们深信:他为之奋斗并鼎力支持的事业绝不可能被打败,它最终必将赢得胜利。当然,这样说并不能穷尽这一成就。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闪光独立于信条力量以外而发挥作用。没有这些,任何新的生活,任何新的人生意义,都不能有效地揭示出来。但这些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

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然性,关于这一努力的中肯和正确性,还有一些话要说。然而,关于上面所说的他对很多失败者的情绪感受所作的系统化阐述,一句话就够了。当然,这并不是对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际感受的真实阐述。我们宁愿称它是一种以社会进化逻辑的真实或虚假的启示来替代实际感受的企图。通过这样做,并通过把他自己的术语“阶级意识”不太现实地说成是群众自发的,他无疑歪曲了工人的真实心理(工人希望的主要是跻身于小资产阶级行列,希望借助政治力量达到这一地位),但是只要他的教导产生了效果,他就会扩大它,拔高它。关于社会主义理念的美好,他没有流下什么多愁善感的眼泪。这是他自称比他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出一筹的优点之一。他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每当他们为利润而忧心忡忡的时候,总喜欢给工人戴高帽子,赞美他们是终日辛劳的英雄。他

完全没有巴结工人的倾向,而在他的一些更软弱的追随者身上,这种倾向往往很明显。对于民众到底是什么,他大概有着清晰的洞察,在他们的头顶之上,他眺望着遥远的社会目标,这些目标完全超出了普罗大众的理解能力。他们从未想到过,甚至更不曾想达到这一目标。而且,他也从未向他们传授他自己设立的任何理想。这种徒劳无益的事情跟他全然无关。正如每一个真正的先知都自封为神的谦卑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亦只不过是在阐述历史辩证进程的逻辑。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一种威严弥补了许多琐碎和平庸的缺点,并且在他的作品和生活中,这种缺点与威严构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结合。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马克思本人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没法与那些粗俗不堪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教授为伍,这些人即使在看见神庙的时候都不认识。他完全有能力理解一种文明及其价值中的“相对的绝对”价值,无论他觉得自己与之相去多么遥远。在这方面,要证明他的胸襟广阔,最好的证据莫过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了。这本小册子不乏赞美资本主义成就的热烈颂词^[1],即使是在宣布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死刑判决中,他也绝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当然,这一姿态暗示了很多马克思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他的这一态度无疑是坚定的,由于认识到了事物的有机逻辑(他的历史理论对此有过详尽的表述),从而使得他更容易采取这一姿态。对他来说,社会事物都有章可循,在他一生当中某些关键时刻,无论他在多大程度上像一个“咖啡馆阴谋家”,但他真实的自我却很鄙视这种事情。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迷念,以至于遮蔽了生活中所有其他色彩,并制造出一种对其他文明的病态而愚蠢的仇恨或轻蔑。正是凭借他的基本立场,他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意志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多重意义上,他完全有正当的理由,为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它当之无愧的名号,这就

[1] 这看上去似乎是夸大其词。不过,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原文:“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段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54~256页。——译者注)瞧,这里提到的所有成就都被归功于资产阶级,这比很多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还要多。这就是我上面那段话所说的全部意思——明显不同于今天被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明显不同于现代非马克思主义激进派的凡勃伦学说的废话。

是：科学社会主义。

2. 社会学家马克思

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令忠实信徒颇感不快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真理之源的东西，任何人想对它做一番冷静的分析，他们自然要感到不快。但他们最感气愤的事情之一，是把马克思的作品切成碎块，然后一块块地加以讨论。他们会说，这一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悟这一光辉的整体，它的所有部分互为补充、互为解释，所以，从其本身来考虑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就会失去其真实含义。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在评析了先知马克思之后，接着再剖析社会学家马克思，这样的冒犯并不意味着我否认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社会构想的统一性，正是这种构想，赋予了马克思著作以某种程度的分析的统一，以及更大程度上的统一的外表；我也不打算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每一部分，无论本质上多么独立，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然而，在这片辽阔领域的每一个部分，依然存在足够的独立性，这使得学者可以接受他在其中一部分领地上的劳动成果，同时舍弃他在另一部分领地上的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信仰的魔力损失泰半，但是，通过打捞重要的、有激励作用的真理，毕竟有所收获，就其本身而言，这要比把它绑在一堆毫无希望的沉船残骸上有价值得多。

这一方法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不妨索性一劳永逸地把哲学问题解决掉。由于马克思接受的是德国式教育，有着善于思辨的头脑，因此他在哲学上有着扎实的根基和强烈的兴趣。德国式的纯哲学是他的起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爱好。他一度认为哲学就是自己真正的职业。他曾经是一位新黑格尔派哲学家，这大致意味着，他和他所在的群体一方面接受了这位大师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同时又摒弃了其他很多黑格尔的追随者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保守解释，并以他们自己的、几乎相反的观点取而代之。这一背景展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只要有展示的机会出现。一点也不奇怪，他的德国和俄国读者（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所受的训练颇为类似）都首先抓住了这一因素，并把它当作理解马克思体系的万能钥匙。

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误会，这样对马克思的科学力量也不公平。他整个一生都保持着早年的爱好。在他的论点与黑格尔的论点之间可以找到某些形式上的相似，他很欣赏这些相似。他很喜欢证明他的黑格尔哲学，喜欢使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但仅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都不曾背叛实证科学，转投形

而上学。在《资本论》(*Das Kapital*)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而且,通过分析他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话而并非自欺欺人,他的论证处处都建立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其论点的真正来源,没有一处是在哲学的领域。当然,那些原本从哲学方面出发的注释者或批评者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相关社会科学所知不多。此外,哲学体系建构者的习性使得他们只接受源自某个哲学原理解释,而讨厌其他任何解释。所以,在关于经济经验的最务实的陈述中,他们看到了哲学,因此把讨论引向了错误的轨道,既误导了敌人,也误导了朋友。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运用了这样一种装备来完成他的工作,它主要由对历史事实和当代事实的广泛掌握而构成。他对当代事实的知识常常显得有点过时,由于他最具书卷气,所以,到达他手里的基本材料(有别于报纸上的材料)总是稍晚。但是,他那个时代的几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只要是具有一般意义或全面视野的,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虽说有很多专题文献为其所略。尽管我们不能像赞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博学那样赞美他在这一领域的学识之全面,但他还是能够不仅借助巨幅历史画卷,而且还借助很多具体细节,来生动地说明他的社会构想,其中大多数细节的可靠性,非但不低于、反而要高于当时其他社会学家的标准。对于他采信的这些事实,他一眼就穿透了其表面的毫无规律,直抵历史事物的宏大逻辑。在这一点上,并非只有激情,也并非只有分析的冲动。二者兼而有之。他努力阐述这一逻辑,即所谓的“经济史观”〔1〕,其结果无疑是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在这样的成就面前,讨论这一成就到底是不是完全的原创,抑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和法国的前辈,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经济史观并不意味着人们被经济动机所驱使——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是完全还是主要的。恰恰相反,解释非经济动机的作用与机制,分析个人心灵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是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素,也是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形而上学、艺术流派、道德观念及政治意志,要么可以还原为经济动机,要么是不重要的。他只是试图揭示出它们赖以形成并因此而兴衰沉浮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2〕的全部论据和

〔1〕 最早发表在1847年的一部题为《哲学的贫困》(*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的著作中,这部著作严厉抨击了普鲁东(Proudhon)的《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另一个版本被收入1848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中。

〔2〕 这里指的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他的文集里所再版的著名研究成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论点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以及这些群体或阶层是以什么方式来解释他们各自的存在、位置和行为,当然是他最感兴趣的東西。他把自己最强烈的愤怒一股脑地泼向了某些历史学家,这些人按照其表面价值来对待这些看法及其言说[即意识形态,或者按照帕累托(Pareto)所说的,称为“派生物”],并试图借助它们来解释社会现实。但是,在他看来,观念或价值就算不是社会进程的原动力,那它们也并非只是转瞬即逝的缕缕青烟。倘若我可以使用比喻,可以说,它们在社会发动机中扮演了传动带的角色。这些理论在战后的一个最为有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这就是“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1]。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有必要提及一下,因为在这方面,马克思不断地被人们误解。就连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也把上述理论的准确意义界定为个人和群体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一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是错误的,而在其余的方面则显得尤为平凡。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为马克思辩护一下,使之免遭另一种误解:经济史观常常被称作唯物史观。马克思本人也这样称呼它。这一术语极大地增加了它在一些人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也增加了它在另一些人当中不受欢迎的程度。但这个称谓毫无意义。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加唯物主义,他的历史理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借助经验科学的手段来解释历史进程的尝试,更加唯物主义。有一点很清楚:这在逻辑上与任何形而上学信仰或宗教信仰是一致的——完全像世界上任何物质图景一样。中世纪神学本身就提供了一些方法,借助这些方法可以建立这种一致性。^[2]

这一理论实际上所说的东西,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社会结构反过来培育了态度、行动和文明。马克思用了一句名言来说明自己的意思:“手工磨坊”创造了封建社会,“蒸汽磨坊”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过于强调技术因素,但是,如果理解了纯粹的技术并非它的全部,那么,这个命题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它稍稍通俗化,并认识到这样做将会损失很多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我们的日常工

[1] 德文单词是 Wissenssoziologie,最值得提及的名字是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后者为德文版《社会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撰写的相关词条可以充作一篇导论。

[2] 我遇到过几个天主教激进分子,其中有一个是牧师,全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采纳了这一观点,而且事实上,他们宣称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除了涉及他们的信仰之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作,形成了我们的思想观念;正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者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以及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社会空间。(2)生产方式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也就是说,它们根据其自身内在的需要而改变,为的是仅凭它们自己的工作来生产它们的继任者。同样用马克思自己举的例子来说明:以“手工磨坊”为特征的体制,创造出了一种社会和经济情势,在这样的情势中,机械碾磨方法的采用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无力改变这一需要。反过来,“蒸汽磨坊”的兴起和运转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新的群体和观念,这些因素以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发展并相互作用,以至于超出了它们各自的框架结构。于是,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推进器,它首先负责推动经济变革,再由经济变革进而推动其他任何社会变革,这个推进器的行动,本身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推力。

这两个命题无疑都包含了大量的真理,而且都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很有作用的假设,正如我们将在后面几个关键之处所发现的那样。目前大多数反对意见都彻底失败了,例如,所有从道德因素或宗教因素的影响方面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或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早已提出的那种意见,伯恩斯坦曾经以一种令人愉快的简单方式直接宣称“人都有头脑”,因此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行动。在说出了上面的这些话之后,几乎用不着详细论述这些论点的不堪一击了:当然,人们所“选择”的行动路线,并非直接受环境的客观事实所强迫;但他们在作出选择时所基于的立场、观点和倾向,并没有构成另外一套独立的事实,相反,它们本身就是由客观形势塑造而成的。

然而,问题来了:经济史观是否只不过是一种贪图方便的近似法,在某些情况下,它所发挥的作用必定不如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那么令人满意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先决条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社会的结构、类型和态度都是一些不易熔化的硬币。它们一旦铸造成型,就会持续下去,多半要持续几个世纪;而且,由于不同的结构和类型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这种存活能力,因此我们几乎总是发现,群体和民族的实际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地背离我们的预期——倘若我们试图从生产过程的主流方式推导出它的话。对这个说法的适用范围尽管十分普遍,但要想最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还是当一种高度经久耐用的结构整体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诺曼人的征服在西西里所创造出来的社会情势,可以形象地说明我的意思。对这样一些事实,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但他可能没有考量它们的全部含义。

这里有一个相关的实例。不妨考虑一下公元6~7世纪封建式地主所有制在法兰克王国的出现。这肯定是当时最重要的事件,它所形成的社会

结构延续了许多个世代,同时还影响了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的生产条件。但对它的最简单的解释,应该从军事领袖的职能中去找,这些军事领袖的职位,先前都是由那些在新地区被明确征服之后成为封建地主的家族和个人所占据(征服之后依然保留了这样的职能)。这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范式,并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指向不同的方向。毫无疑问,可以借助辅助性的假说把此类性质的事实纳入进来,但插入这种假说的必要性通常就是一种理论告终的开始。

在试图借助马克思的范式来解释历史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可以通过承认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决。^[1]但是,笼罩在它周身的那种基本真理的魔力,恰恰取决于它所宣称的单向关系的严谨和简单。如果连这个都成了问题,那么,经济史观将不得不与其他类似命题为伍:成为为数众多的局部真理之一,或者,干脆让位于其他能说出更加基本的真理的理论。然而,无论是作为一项成就,还是作为一种有用假说的简便性,它的地位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当然,对于忠实的信徒来说,它简直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即使我们有时候很想嘲笑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有点天真的应用,我们也应该记住,它所取代的究竟是何种论点。记住了这一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再一次,他的社会阶级理论首先是我們不得不记录的一项重要贡献。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这件事情上,经济学家们出奇地迟缓。当然,他们一直在给行为入划分不同的类别,因为正是这些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他们所处理的过程。但这些类别只不过是一组组显示了某种共性的个人,因此,某些人被归类为土地所有者或工人,因为他们拥有土地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而,社会阶级并不是分类观察者的产物,而是原本就存在的活生生的实体。它们的存在必然导致某些结果,而如果一种范式把社会看作一个漫无组织的个人或家庭的集合,那它就完全看不到这些结果。对于纯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来说,社会阶级的现象究竟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实际应用来说,以及对于一般社会进程中的所有更广泛的方面来说,它非常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

[1] 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